

一场出逃的旅行：论许通元小说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情动体验¹

杨慧莹、蔡晓玲*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许通元（1974-），积极投身于马华小说创作与同性性别研究，其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是颇具代表性的马华同性爱小说，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本文以此小说为主要研究文本，适当结合其他马华小说中的同性爱情节，以情动体验为研究视角，从“羞耻”与空间、情感隔离与反“羞耻”、情感修复与身份缺失等三个方面探讨情动体验与同性恋者身份、书写策略的关系，以此研究马华小说中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情动体验不仅为逃离“正典”提供可能，也为同性恋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情感关怀，同时为性别书写与阅读提供思考策略。

关键词：马华同性爱小说，许通元，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情动体验，自我身份认同

¹ 此论文参加由广东省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汕头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第十七届广东省外国文学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与台湾清华大学华文文学研究所举 2023 湛华研究生及大学生学术研讨会。

* 杨慧莹，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蔡晓玲，博士，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A Journey of Escape: A Study of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Xu Tongyuan's Short Story *My Teacher Is A Terrorist*

YANG Hui Ying, CHAI Siaw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Xu Tongyuan (1974-), a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actively engaged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and research on homosexuality, has authored a representative Malaysian Chinese homosexual short story *My Teacher is a Terrorist*,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under the same title. This paper takes this short story as the main research text, appropriately supplemented by homosexual plots in other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y. Taking affective experience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self-identity of homosexuals, as well as the writing strategy, from three aspects: shame and space, affective isolation and anti-shame, affective repair and identity loss, so as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of homosexuals in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ies. Affective experience not only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escaping from the canon, but also provides affective care for the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of the homosexu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a thinking strategy for the writing and reading of homosexuality.

Keywords: Malaysian Chinese homosexual short story, Xu Tongyuan, *My Teacher Is A Terrorist*, affective experience, self-identity recognition

一、前言：情动理论与〈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许通元（1974-），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现任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馆长、马华文学馆主任，《蕉风》执行编辑，曾获大专文学奖小说组第一名、第二名佳绩。许通元以同性性别书写为视角，从事马华文学史的整理工作，相继汇编小说集《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2007）与《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2019），并积极创作马华小说，代表小说集有《双镇记》（2005 年）、《埋葬山蛭》（2011）、《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2018），散文集《舌挑新山：许通元饮食散文集》（2023）等，其中关于同性恋小说的创作尤为醒目。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收录了许通元的九篇短篇小说，如张光达的点评：这些小说具有诡谲奇幻的故事，颓靡不羁的文字，爱欲与死亡、感官意象与非理性的况味、古怪乖张的人物关系充斥全书。在种种古怪和乖张的人际关系与人物生活情感底下，其中尤以溢出同志正典（homonormativity）的酷儿情欲最引人注目（或侧目）（张光达，2017）。

许通元的同名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收录在短篇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小说中的人物“我”与“你”因“意外”的邂逅而开始一场出逃的旅行，在这场旅行中呈现出马来西亚性别、文化、历史、政治等多种元素，作者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日常图景与对话互动中，在旅行中隐现着同性恋者的情动体验。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还有为“我们”当旅游向导的马来友族同学萨风，以及贯穿全文的恐怖分子——“我们”曾经的老师，阿查哈里。小说的故事情节与隐藏线索在魔幻与现实中盘旋交错：“你”与萨风的真实身份，阿查哈里成为恐怖分子的原因，“我”与“你”暧昧不清的关系等等。这些迷惑与困顿在小说中没有明确的答案，一切的猜测既在情理之中，也在预想之外，这样的叙述张力极尽想象之能势，成为解构“正典”的潜在契机，为情感修复的理想阐释留有富余的情思，这些看似偶然却内涵玄机的暗示，也循序渐进地将读者引入层层谜境。此外，在阅读时可以与收录在小说集《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另一篇小说〈传说也跟着逃亡〉形成互文阅读，两篇小说在“传说”与“逃亡”中共筑文字的隐喻图鉴。

在解读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时，对于情动体验的思考来自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的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情动概念源于斯宾诺莎，其后发展出两条路径，其一是马苏米到德勒兹的本体论研究，其二是塞吉维克注重情感力量的情动理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强调的是前语言状态下的身体、情动之于主体的重要性（郑国庆，2019），如塞吉维克认为：问题不在于知识的真实性，而在于知识的效力（force）……知识的领域比较不是由纯哲学构成，而是由心理学构成，特别是情感和情绪的心理学（Sedgwick, E. K. 著，金宜蓁、涂懿美合译，2022，页 99）。由于塞吉维克对于“知识效力”的重视，情动理论为酷儿研究敞开了更多的情感关怀，其中包含对于情感阅读的关怀

性阐述：“从一个建基于情感的阅读来看，最值得注意的那个在重复召唤的揭发场景中被假设存在但尚未被检视的力量。”（Sedgwick, E. K. 著，金宜蓁、涂懿美合译，2022，页 100）在一定程度上，这份“被假设存在，但尚未被检视的力量”为同性性别研究提供了多元的包容话语。

在对情动理论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可适当联系当下酷儿研究与同性爱文本面临的两个困境，其中一个困境是酷儿理论对于情感的忽视，如刘芊玥写道：“大部分有关酷儿理论的讨论是完全忽略情感状态的，因为它根深蒂固地定义着什么是酷儿，而不是什么像酷儿。”（刘芊玥，2018）而另一个问题是同性恋群体面临单一的主流走向，即“正典”的确立使同性恋者的其他负面情感与情欲遭到排斥²（张光达，2017），这会隐没多重话语的发声权力，因此，酷儿论述必须突破这个正典的形象，建构另类想像，拥抱负面性的情感 and 情欲，直抵死亡驱力本身。（张光达，2017）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则可以通过情感的修复来对这两方面的不足进行补充。情动理论主要从“羞耻”情感与“修复性阅读”两方面进行商榷，通过对于“羞耻”等负面情感的辨析，并以“修复性阅读”进行情感体验，可以使同性爱逃匿“正典”的主流想象，包容酷儿的复调声音，使同性恋者的形象免于单一的定义，为其自我的身份认同提供多重参考路径。

本文主要以马华作家许通元的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为研究文本，适当结合其他马华小说，以情动体验为研究视角，从“羞耻”与空间、情感隔离与反“羞耻”、情感修复与身份缺失三个方面，探讨情动体验与同性恋者身份、书写策略的关系，致力以情动体验探讨马华小说中的同性爱自我身份认同问题。总之，情动体验为逃离“正典”想象提供可能，为同性恋者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情感关怀，也为同性性别书写与阅读提供思考策略。

二、逃亡或传说：“羞耻”与空间

“羞耻”是同性情欲无法躲闪的课题。“羞耻”往往被看作一种负面情绪，同性恋者的“羞耻”感不仅是对自身情感的抗拒，也是对父系权威的深切畏惧。《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以“精神斗争”来形容“我”的出逃，这可将其理解为同性恋者对待“羞耻”的方式之一。“羞耻”在干扰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在建构认同，

² 张光达在序言《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序许通元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写道：近年来酷儿研究从空间（衣柜、身体、地理、疆界）转向时间的面向，对酷儿研究的学者来说，同性性别运动的批判性与政治性，已被新自由主义所强调幸福家庭和同性婚姻的单一论述所收编，主流同性恋者都在提倡阳光正面的生活价值，其他处在阴影底下、具有负面的生活情感与情欲感受被同性恋者自身所排斥弃绝。在最近这一波酷儿研究的时间转向中，学者们强调一种酷儿的“负面”的时间观，即酷儿时间的断裂、倒退、落后，与耻辱情感的连结。

就和污名一样, 羞辱本身是一种沟通的形式……也是想要重建人际联系的欲望的信号。(Sedgwick, E. K. 著, 金宜蓁、涂懿美合译, 2022, 页 102) 从“羞耻”的产生的原因来看, 往往是由于某种思想、行为对于常识规则的违背, 其中也透露着被“凝视”的畏惧。常识是映衬在文化背景中的固有认知, 并逐渐在日常生活中规训人们的智识状态, 同性恋者的“羞耻”情感不同于恐惧心理。如果说恐惧是源于对未知图景的抵触, 那么“羞耻”则是明知故犯的欲拒还迎。“羞耻”本身充斥着矛盾与悖论, 尤其在同性爱情欲中, 与异性恋体系相悖的“羞耻”情感与性取向相连, 从而引发同性恋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游移。

在同性爱小说中, 对于“羞耻”情感的遮蔽可以通过对空间的置换进行藏匿, 同性恋群体为规避“羞耻”状态, 形成了同性恋文化圈的地方标签, 如酒吧、公园、厕所、浴池、咖啡厅等地。在许通元笔下, 同性恋者的“羞耻”心理也与空间照应, 但并非局限在封闭空间中, 作者将空间进行延展, 打破空间的限定, 如〈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开篇写道:

他间接地宣示新女友的出现。从此以后, 我必须敏感地关注呼吸的空间, 以及自己适合与他共存的空间。对于他, 我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多余的角色。(许通元, 2018, 页 18)

因为“他”找了新女友, “我”则无法再与“他”有合适的共处空间, 这里的“空间”不只是实体的空间, 也指个人私密的情感“空间”, 当“我”的情感“空间”被占据, “我”便如难民般失去家园, “多余的角色”使“我”成为零余者, 于是“我”想方设法地进行“逃亡”:

内心的逃亡蠢蠢欲动。精神斗争之可怕绝不亚于任何一种战争。捷克著名小说家赫拉巴尔赞美韩波说得正确。精神逃亡之痛苦, 绝不亚于任何一位战争难民所负荷的。(许通元, 2018, 页 19)

渴望摆脱“羞耻”的欲望往往会使自我被更强烈的羞耻感所吞噬, “羞耻”揭露了“他者”才能拥有的关于“我”的无限知识, 但自我永远无法与想象的全能“他者”的斗争中获得胜利(Katz, Jack, 1999, 150), 这便是同性恋群体的“精神斗争”与“精神逃亡”的关键因素。张光达认为〈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在逃亡旅途中借助一种倒退断裂的时间观, 例如欲望、情欲、身体的颓废流连的时间与非俗世的伦理教义时间……及承诺幸福家庭虚假意识的质疑和批判(张光达, 2017)。虽然近年来, 酷儿研究有从空间转向时间的面向, 但在现代性的“时

空压缩”³中，时间与空间并不能完全分隔，尤其在以人的情感体验为研究面向时，时间与空间往往是相互制约的。张光达将“逃亡旅途”与“倒退断裂的时间观”相连，那么许通元则是将“逃亡旅途”与延展的空间相系，打破了酷儿地理场所的固有标签。

在许通元笔下，延展空间中的同性恋者具有情动体验的多种可能，联系许通元的另一篇小说《传说也跟着逃亡》的题目，则可呈现出同性恋者因“羞耻”而显现的心境。这如“传说”一般，悲凉与浪漫汇于一处，在提供多元可能的同时，马华社会的同性恋群体也面对迷途与恐慌，如小说中写道：“传说随时可以编制，况且，逃亡早已形成了自然的生存现象。”（许通元，2018，页 76）“正常”与“逃亡”的本末倒置现象，隐现着同性恋群体的精神颓废与心理内耗，这不禁要问，这样的少数群体要逃亡到何时何地才能不再流亡。联系收录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另一篇小说《悬吊半空的男人》，其中有一段描述恰如其分地呼应小说题目：

米黄墙上悬挂一幅黑白海报《悬吊半空的男人》，在天花板的橘黄灯光照射下——空中横杆上排排坐的男人正享受午餐。应该不能算享受，若是我静静地坐在高空横杆末端，没吓出一身冷汗，身子不硬得似一块石头转眼往下掉才怪。在半空中如何能“享受”，应是“正用午餐”。或许他们无畏高症，反而享受高处，似我观赏的一部电影《欲望天堂》（*Among Giant*），男女主角认为身在高处是一种高级享乐，有事没事攀高。铁塔，高楼大厦，电灯柱，油漆工程鹰架，简直无高不欢，仅差在上面风流快活，踏到地表时才有如回返人间的不快活。（许通元，2018，页 80）

画中男人们身处高空却自得其乐，如同“享受”高处，而“踏到地表时才有如回返人间的不快活”。这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沉溺乌托邦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自救方式。虽然在人类成长的过程中，羞辱目前被广泛的视为最清楚定义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情感（Sedgwick, E. K. 著，金宜蓁、涂懿美合译，2022，页 103）。但研究者并不能完全以外位性的视角去要求当事人进行理论操演，少数群体并非是整齐划一的标签，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有能力与勇气去经历并感受“羞耻”，试图在经历“羞耻”后的浴火重生，只是理想型的展望，而渗透顿悟、寻回自我、构筑身份认同的期待，也只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美好愿景。虽然大多数同性恋群体躲在“柜”里，可即便走出“柜”门，依然有可能处于高空而远离现实，居于高空虽然可以打破固有的地理空间限制，却无法摆脱心灵空间的不

³ 大卫·哈维在其著作《后现代性状况》中以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则将时间和空间体验与后现代性相连，从而对时间与空间进行辨析。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时空压缩”指剧烈改变空间与时间之客观性质的状态，我们因此不得不以非常急遽的方式，改变和适应我们向自己再现世界的方式。现代性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改变了我们经历与理解时间与空间的方式（宁云中，2012，页 198-200）。

安与焦虑。这并非意味着脱离世俗, 高空中的虚幻依然面临被重新“凝视”的危机, 如翁弦尉的小说〈天光〉中的描写:

我知道这一切的期待恐怕终究会落空, 在这第九九楼的天空上, 你抬头可以望见茫茫大海、远处停泊全球的邮轮, 整个世界的灯火, 垂头你却不能保证什么东西掉下去不会是无坚不摧的? 没有什麼承诺可以在第九九楼的天空上可以像一簇雨雾那样聚拢不去, 打开窗口, 稍不留神, 这里的强风足以把一个人的头颅给刮去。(翁弦尉, 2019, 页 125)

即便在“第九九楼的天空上”可以俯览“世界的烟火”, 却仍然面临“强风”的席卷。无论处于“柜”内还是高空, 酒吧或是公园, 亦或这场出逃的旅行, 这些少数群体看似拥有天地, 而心无栖息之所。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 多数同性恋者直面“羞耻”并非易事。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同性恋者而言, “羞耻”情感的背后所承载的是文化建构与社会规范的重压。〈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试图将马华同性恋者的重重压力放逐在这场旅行中, 而同性恋者面临的“精神斗争”, 也不仅是梁伟彬的小说〈剩下是全部〉中描述的“弑母”情节。“弑母”情节是同性恋群体对固有文化秩序、社会体系禁锢的对峙, 可是即便同性恋群体脱离封闭空间, 逃离外部禁锢, 若内部没有情感向度的依托, 自我放逐依然会不断生成, 并可能演变成为生存的常态, 甚至与“自弃”或“自杀”相应。因此, 马华同性恋群体在面对内在“羞耻”时, 如何与自我沟通, 与自身和解, 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尤为关键。

三、“柜”里或“柜”外: 情感隔离与反“羞耻”

同性恋群体在面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游移时, 如何处理自身的“羞耻”情感是需要直面的关键因素。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 “羞耻”不仅表达为一系列生理反应, 它还以一种不容拒绝的方式强迫当事人面对并审视自我的存在以及“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张牧人, 2022)。生理反应与心理反应是相互作用的, 二者共同体现着“羞耻”。“羞耻”的独特性在于它区别以愤怒为代表的他者导向(other-directed)的消极情感, 这是对自我存在的整体性否定, 触发后的首要反应是自我遮掩(张牧人, 2022)。在小说中, 这种“自我遮蔽”的首要反应是以情感隔离的方式显现, 即“我”通过情感隔离拒绝“我”的存在和“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 这是马华同性恋群体在面对“羞耻”情感时经常采用的自我保护策略。

情感隔离的“情”是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情感连结, 用王德威提出“情”的概念来解释, 即“此处的‘情’是感情、也是人情、世情; 是人性内里的七情六欲, 也是历史的情景状态 ‘情’是本然真实的存在, 也是审时度势

的能力。”（王德威，2019，页4）这样看来，“情”有着宽泛的内涵与外延，“情”的“真实的存在”是“世情”部分，可以理解为社情，即社会现状，这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通常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表现出来。而“审时度势的能力”可以归于人情的范畴，人情并不是孤独隔离的情感，人情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情与社情共同构成了人的情感体验，二者在沟通与对话中形成的张力，从而显现出情感的丰富性。虽存有矛盾与摩擦，却也是应运而生。但是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我”是拒绝体验情感的，虽然“我”通过这场旅行试图打破封闭的实景空间，为逃避内心的“羞耻”情感。“我”在不断延展的旅行中，以情感隔离的方式阻碍了与“他者”的情感交流，于是“我”安排了这次逃亡，没有告诉任何人：

收拾衣物，提起背囊，我放低声响开启钢锁，希望连邻居也没察觉我离去的步伐。走入电梯时，灰蓝衣的保安询问我知晓，住我右边的邻居太太在昨晚跳楼自尽。我哦了一声，不知晓这些与我如今的不告而别有什么关系。（许通元，2018，页19）

细读此段文本，可以看出“我”对于无关于己的人事的冷漠，这些与逃亡的“我”没有关系。“羞耻”连接社会与个人的情感，而“我”断除与社会的所有联系，以情感隔离的自我保护方式作为隔离“羞耻”的手段。这可以通过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与小说《传说也跟着逃亡》进行互为对照的解读。《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更注重情节的叙述，而在《传说也跟着逃亡》的“理由”篇中，则是对旅行中的细节进行铺陈，并袒露着“我”的情感自白，描述了“我”在进行“逃亡”之前的精神孤立：

“我是习惯黑暗，渐渐失去光亮后。”你不晓得故意还是好心，为我开盏灯。我扑过去关灯，仿佛在曝光之后立即烟消云散。走向房中，关门上锁。紧闭房门，隔断了客厅的空气，以为就此切断所有的关系。（许通元，2018，页66）

“我”在“出逃”之前的状态是“走向房中，关门上锁”，这与同性恋群体躲于“柜”中的情景相似，即将自我锁在黑暗之中。“客厅”在住所中起到招待客人的功能，是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通道，而与“客厅”隔绝，说明“我”试图脱离“他者”与社会的人际关系而进行的自我孤立。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如上节论证，“我”是以延展空间的方式进行一场旅行，但无论是出逃之前躲在房里的“我”，还是出逃后旅行天地的“我”，重点都不在于“柜”里或“柜”外的空间仪式，而在于情感空间是否得以保留或栖息。当“出逃”以情感隔离作为一种反“羞耻”的方式时，即便肉体可以自由地隔断与社会的关系，但精神层面依然停留在“柜”中，这也是当下马华同性恋群体面临的困境。即便“出柜”，但“出柜”的仪式是否可以达到如期的效果是值得商榷的。“出柜”的行为在一定意

义上是为了重新建立与社会、他人的联系,“出柜”仪式的意义不在于操演,而是少数群体在身份角色与社会关系中的重新定位。但“出柜”又何尝不是一种打破“柜”而再次建立“柜”的过程,就如〈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即便“我”的空间被延展,出逃看似是一种走出“柜门”的方式,但却依然走在反“羞耻”的路径上。一直以来,“羞耻”被看作负面情绪,如塞吉维克虽然以情动理论提起“羞耻”的积极效应。但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数同性恋者依然无法走出“羞耻”情感背后的社会文化体系,反“羞耻”的方式正是承认“羞耻”的思维逻辑基础上的据理力争,就如“出柜”的前提是承认“柜”的存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正是以旅行的方式打破人们对于“柜”的固有认知,并警醒读者关于“出柜”与“入柜”的现实考量。

小说中“我”与“你”的暧昧不清的互动对话可以作为“我”反“羞耻”的具体方式。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我”对“你”表现出躲闪的情感,在躲闪的情感假面后,遮蔽的是“我”进退两难的自我身份抉择。当“我”与“你”巧遇,“你”说出:“这么多年没遇见,远远地瞥见背影,马上就认出来,真好”,而“我”仅是以“是吗?”(许通元,2018,页20),作出淡淡地回答,以此掩饰“你”的突现与“我”的惊讶,而在小说〈传说也跟着逃亡〉中,“我”则以自白的方式道出自身的苦闷与思念:

始终没告诉你,有时好想打电话给你。在假期特想你的时日去探望你。然而知晓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自己漫无边际的思念,然后将思念钉死在文字中。(许通元,2018,页73)

因为知晓“我”与“你”的不可能,只能丢弃想象中的可能,于是“我”压抑了所有的可能性,不仅在行动上去克制,也将“思念钉死在文字中”。文字本是用以记录事件、传情达意的媒介,将同性情欲从文字中剥离,这是失语状态下的精神苦闷,抑郁彷徨的“我”开始一场逃亡的旅行,实则是将自我身份进行放逐,也是“我”对于同性情欲的流放。放逐情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外部环境给予的重负,也是因为情感无法获得回应使“我”失去了修复情感的能力:

或许你一直以为我在开玩笑。认真的感情总是容易凋萎,不留痕迹,除了内心无法探测的忧伤。(许通元,2018,页66-67)

“其实这么久没互通音讯,你有没有想过我?”“有用吗?”我反问。“真的很开心再遇见你,尤其在这个时刻,还可以来到仿佛世界只剩下你和我的地方。”“你想要说什么?”“可不可以……亲吻你?”“男男授受不亲。”“我以为你一直在痴等着我回来。”“少来。”我屈缩双脚。(许通元,2018,页50)

“开玩笑”也许是应对“羞耻”的机敏途径，但一并放逐的也是“认真的感情”。“开玩笑”使话语的本身意义失真，而将意义的外延无限扩大，虽然不能完全淹没真实的私语，却让秘密溜入私人密语，其中的暧昧气息意犹未尽，如猜谜一样真假难辨。在“我”与“你”的话语互动中，潜伏着情感的流动与遮蔽，也暗含着情动的可能性，对话中的“我”巧妙地避开“你”的话语，可以取消确定性，将具有可能性的所指意义进行延展，这份不确定的情愫巧妙地取消了二元对峙，跳出了关于同性情欲的肯定或否定的界限。同时，避而不谈的互动对话，增强了遐想空间以及同性情动的可能性，真实的情感躲闪在暧昧关系的角逐中，也是为了遮蔽真情无法回应的同性恋者的“羞耻”感。

四、读者与作者：情感修复与身份缺失

在《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重视情感体验的修复性力量为作者与读者的共鸣产生精神上的安顿，以情感修复为创作方式为小说敞开了多重解读思路。《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的故事发展线索取消了单一的确定性诉说，以多种可能性激发读者的遐想空间，这种创作方式与许通元注重读者感受力量，将阅读阐述权力交还读者的观点相关。

许通元在探讨马华文学中的同性爱主题时，在文章《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中将马华同性爱小说阐释为“马来西亚华人书写关于同志生活、生命为情节的小说”（许通元，2007），后来补充说明“马华”的概念广义的涵盖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出生，1965年前出生于新加坡的马来亚人等（许通元，2019）。在《寻溯最早的马华同志小说——论析王探《育南与但米》》中，许通元对于马华同性爱小说的概念增加了纪大伟提出的读者“感受到”的解读方式，进一步将马华同性爱小说解释为：“马来（西）亚华人，包括南来华裔作家书写关于同志生活、生命为情节及让读者感受到同性恋情谊（包括亲密同性友情情谊）的小说。”（许通元，2020）这与纪大伟重视读者阅读的观点相得益彰，纪大伟“暂时”将“同志文学”定义为“让读者感受到同性恋的文学”。（纪大伟，2017，页22）之所以定义为让“读者感受到同性恋的文学”，其一是为了制衡“由作者决定同性恋内容的文学”，这样会导致偏袒作者的立场；其二是注重读者的地位，让读者不在文学领域中缺席。曾昭程在专访许通元时，对许通元的创作理念作出评价：“俨然‘作者已死’，也仿佛对读者深具信心，认为我们均可参与‘可写性’文本的无限解构/解读。”（许通元，2017）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注重读者感受力量，或是塞吉维

克的修复性阅读⁴, 这些理念想要达成理想的效果, 离不开对创作策略的探讨, 若要试图激起读者的情动体验, 则需读者达成情感上的共鸣与包容, 也需作者以机巧的文笔赋予小说以生命情感, 使小说创作变得鲜活。例如, 填补空白的前提需有空白可供读者填补, 小说若能体现出意犹未尽的韵味或悬而未决的机谨, 自然会引导读者探秘阅读场域, 许通元则以情感修复的方式将小说的阅读环节交给读者, 将铺陈的情愫融入人情。

诉说讲求机巧, 创新亦需真诚, 以情感修复身份缺失可激起读者深切的思考。在小说中, “我” 身为同性恋者, 无法直面自身的情感, “我” 出逃社会关系的同时也放弃了对自我身份的识别。小说开篇提到两部电影, 《爱比死更冷》与《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这两部电影都是法斯宾德导演的作品, 法斯宾德影片中的电影人物离不开对“边缘人”的叙述, 《爱比死更冷》的拍摄恰似景观实验, 凝视着爱情的冷漠与间离, 理性与感性的对峙呈现出角色对于身份定位的迷茫。电影《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则采用了开放性结局, 在结局处, 运用隐喻与噩梦留下遐想, 人物弗兰兹的模糊同性性向亦是耐人寻味。在不定性的身份界定中, 许通元以两部电影暗示着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走向, 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的梅茨对弗兰兹的隐瞒, 二人在猜忌与闪躲中欲言还休, 这与“我”和“你”惟妙惟肖的互动模式相互照应。在看似机敏的语言闪躲背后, 是多重身份所承受的精神压力, “我”无法承受自己的同性情欲, 因此无法承接“你”的暧昧挑衅, 就像“你”无法言说“你”与恐怖分子身份的真实关系。文中有描述“你”似乎与萨风开始保持一段距离, 不知是对此课题无兴趣, 还是故意避开某种东西(许通元, 2018, 页 49), “你”或是“心事重重地不说二话”(许通元, 2018, 页 48), 因为多重身份之间的冲突, “我”和“你”皆对自己的某种身份进行压抑或隐瞒。这好比“出柜”仪式将身份彰显, 但同性恋者的其他身份, 如家庭身份与社会身份则会受到冲击。因此, 对于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身份认同的思考, 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多重身份的判断, 也是关于多重身份的包容课题。小说中“我”和“你”是对某种身份的闪躲, 也显示出个体身份具有的流动性。在旅行中“我们”追忆阿查哈里作为老师身份时与学生和谐相处的情景, 而后变为恐怖分子的事件是对阿查哈里原有身份形象的颠覆。然而, 阿查哈里的心愿是让“我”将金蝴蝶钥匙交给在马六甲野新的父亲, 这表明即便阿查哈里成为恐怖分子, 但是身为家庭成员的阿查哈里依然对“家”有眷恋之情。不仅如此, 小说中并未言明“你”与阿查哈里的真实关系, 但“你”将“我”引入旅途, 旅行中的温馨朦胧情愫, 以及在小说最后“我”与“你”发生关系, 又何尝不是一场圆梦之旅。在这场出逃的旅行中, “我”、“你”以及恐怖分子老师, 皆完成了在世俗规范中无法重合的

⁴ 修复性阅读理论的核心是一种新的学术态度和立场: 一方面用尊重和关爱取代或补充批判传统中的怀疑和偏执, 另一方面不再反复揭露、谴责各种已知的“人民公敌”, 而是像酷儿群体那样从不利于自己的文化中汲取养分, 重获生机。此外, 中国的亚文化社群中同样存在大量的修复性实践。如粉丝以媒介文本为基础创作的同人文就出于修复性动机。粉丝通过创作和阅读同人文弥补自己喜爱的文化客体的缺憾, 延续、丰富客体的生命力, 以便从中获得更多快感和滋养(杨玲, 2022, 页 27-36)。

身份扮演，消解了单一的身份属性。在小说结局，“你”走后留下一封信来解释，但文中也没有透露信件的内容，看似悬而未决的断续，实则是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情感温存。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中运用了魔幻与现实相结合的修复方式，似有魔法般神出鬼没的老师阿查哈里；说出秘密则会失去光泽的金蝴蝶型钥匙，离开森林后，十三环节的多脚小虫也变为普通虫子；芒果若携带回家也必受毒咒的传言等。这些神秘而隐晦的留白吸引读者对小说情节进行填充修复，作者也会留有一些线索指引读者，以防在浩如烟海的遐想中完全迷失，如小说中对于上述魔幻现象的指引：“有些生物仅能寄居于此地生存。走出了森林，它就会自然形成一种保护膜或另一种形体，不让自己受伤害。”（许通元，2018，页55）此处的解释可以进行一语双关的追觅，与上文提及“我”以情感隔离的方式保护自身不受伤害的理解相对应，然而究其本质，为何走出“森林”的特定场域便会形成“保护膜”，这与同性恋群体的身份认同相呼应。在《传说也跟着逃亡》中，作者也以现实与魔幻相结合，将“传说”篇与“理由”篇相互补足，在“传说”篇中以各种传说故事来隐喻关于“逃亡”的秘密，其中包括不同版本传说的可能性，以及“我”试图篡改传说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几个“传说”都与“水”的意象有关，如“莲花”“地下宫殿”“魔龙”等，尤其是对“鳄鱼”的提及，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台湾作家邱妙津的长篇小说《鳄鱼手记》。《鳄鱼手记》中的“鳄鱼”象征着生存在异性恋主流社会的同性恋群体，他们就如“鳄鱼”一样需要穿着“人装”进行隐身，这是“鳄鱼”保护自身不受伤害的“表演”，而这种“表演”正是隐藏自我身份的遮蔽。再联系许通元的另一篇小说《蛇氏药房》，此小说借用《小王子》的引文：“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一种表象，最重要的部分是目不可见的。”（许通元，2018，页148）这说明“看见的”与“感受的”是不尽相同的，“看见的”可以是客观的言说，而“感受的”则是情感的共鸣，这对于创作而言，既是情感修复的方式，也并非局限在同性情爱的小情小景，适当地超出同性恋者私我创作的范围，与许通元对马华同性爱小说的创作路径相呼应，如许通元认为同性爱书写或许仅是其中一条路。结合不同元素，会让原本的题材更加丰富、多元，尤其是探索从未开拓的另一条小径，希望会成为一条真正的“路”或“道”（许通元，2017）。这样的“道”与“路”滋养了包容的话语与无限的想象，使阅读从单一经验复述转向多重情感诉求，使阅读过程中的身份修复与审美价值齐头并进。

五、结语：出逃与身份

在马华小说中，女性书写的出逃与身份往往获得较多的关注，而在马华文学的性别研究中，出逃与身份的探讨也具有相当宽阔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许通元的

短篇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的分析, 可以看出马华同性恋者在探求自我身份认同时所面临的困境。

本文在分析小说〈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时, 从“羞耻”与空间、情感隔离与反“羞耻”、情感修复与身份缺失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结合酷儿理论的研究理路, 可联系至近年来马华文学中性别研究的面向。许通元将魔幻与现实, 创作与阅读, 情动与羞耻, 小说与电影, “柜”内与“柜”外等多重话语结合, 试图打破性别研究的局限, 致力将思想内涵与时代脉络接壤, 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 也为读者的情动留有更多的填补空间。情动体验的视角, 不仅为逃离“正典”提供可能性, 也为少数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提供情感关怀, 同时为马华文学中性别书写与阅读感受提供思考策略。

总之, 马华文学中的性别研究及同性爱课题需结合真实的个人与社会语境, 探讨富有鲜活质感的情动体验, 而非落入整齐划一的标签化身份研究。而对于酷儿理论的借鉴与参考, 也需以思辨的精神播种人文的火种, 对于马华同性恋者自我身份认同的探讨则是对于人情与性灵的真实关怀。

参考文献

- 纪大伟 (2017)。《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联经出版公司。
- 刘芊玥 (2018)。“情动”理论的谱系。《文艺理论研究》, 6, 1-211。
- 宁云中 (2012)。时空压缩与后现代文学想象——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阐释与文学表征。《湖南社会科学》, 4, 198-200。
- 王德威 (2019)。《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翁弦尉 (2018)。天光。载于许通元 (主编), 《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107-134)。有人出版社。
- 许通元 (2007)。假设这是马华同志小说史。载于许通元 (主编), 《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页 209-247)。有人出版社。
- 许通元 (2007)。《有志一同：马华同志小说选》。有人出版社。
- 许通元 (2018)。《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许通元 (2018)。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载于许通元 (主编),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7-61)。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许通元 (2018)。传说也跟着逃亡。载于许通元 (主编),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64-77)。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许通元 (2018)。悬吊半空的男人。载于许通元 (主编),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80-100)。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许通元 (2018)。蛇氏药房。载于许通元 (主编), 《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30-148)。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许通元 (2019)。《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有人出版社。
- 许通元 (2019)。马华同志小说史 (一)。载于许通元 (主编), 《号角举起：马华同志小说选 2》(页 256-315)。有人出版社。
- 许通元 (2020)。寻溯最早的马华同志小说——论析王探《育南与但米》。《台北大学中文学报》, 27, 223-263。

- 杨玲（2022）。修复性阅读、后批判与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文艺理论》，5，27-36。
- 曾昭程（2018）。【附录】有幸知其人，读者当自强：专访许通元。载于许通元（主编），《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页 172-198）。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张光达（2018）。逃亡、鬼魅叙事、倒退的时间。载于许通元（主编），《我的老师是恐怖分子》（序）。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张牧人（2022）。羞耻、修补性阅读与文学情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7-36。
- 郑国庆（2019）。试论塞吉维克的情动理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6-11。
- Sedgwick, E. K. (2022)。《情感与酷儿操演》（金宜蓁、涂懿美译）。《性/别研究酷儿理论与政治专号》，第三、四期合刊，90-108。
- Katz, J. (1999). *How Emotions 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